

中国早期小说考辨

马振方 著

博雅文学论丛

北京大学出版社



014033853

I207.41
104

中国早期小说考辨

马振方 著

博雅文学论丛



北京大学出版社



I 207.41
104



北航

C17216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早期小说考辨/马振方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2
(博雅文学论丛)

ISBN 978 - 7 - 301 - 23704 - 5

I. ①中… II. ①马… III. ①古典小说 - 小说研究 - 中国 - 先秦时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6746 号

书 名: 中国早期小说考辨

著作责任者: 马振方 著

责任编辑: 徐 迈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3704 - 5/I · 270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邮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46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1 印张 267 千字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中国小说发轫于先秦

——代前言

研讨中国小说的发轫时代,须首先明确小说概念。我们这里讨论的小说,是由作者自觉虚构又非寓言的完整叙事之文,亦即现代小说的概念。它包含自觉虚构性、完整叙事性和非寓言性等文体特征。自觉虚构性使小说既区别于史传及其他各种纪实文体,也区别于常涉虚幻却无自觉虚构性的神话与民间传说;完整叙事性使小说区别于种种零星言事的丛残小语;非寓言性的寓言指现代观念的寓言,即以“比喻的艺术形式”和显见的夸诞意象彰显人所共识之理或箴言的叙事之文,而非文体蒙昧时代将种种寓意或虚构叙事统称作寓言的那种“寓言”。胡念贻先生说得好:“我们今天清理文化遗产,首先要按古代一些典籍的内容对它作科学的归类,使之各得其所。”^①小说发展到今天,尽管形态形形色色,与其初生的童年千差万别,但都具有上述三种文体特征。凭借这些特征,我们即能辨明哪些是小说,哪些不是,为今之小说找到它的早期同类,从而确定其发轫时代。

小说还有与生俱来的愉悦审美功能,即非实用性。但以抽象的文字语言符号为唯一表现手段的小说,与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不同,其愉悦性与美感不能脱离意象塑造和题旨表达而独立存在,从古老的《穆天子

^① 《〈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

传》到今天的现代、后现代小说,没有哪一部是纯娱乐小说。小说如果全无意象,不知所云,它就只剩下一堆文字符号,其愉悦功能也就消失了。反之,读者对作品描述的意象有所领悟和感受,同时也就程度不同地得到愉悦与美感。所谓非实用性,是指它不同于纪实、议论及书信、日记、布告等实用之文,而不是指其以意象表达题旨的功能。因此,子史书中麇入的那些既属自觉虚拟又非寓言的独立意象就是小说家的创造,属于早期小说作品。小说是发展的,其愉悦、审美的功能也随之发展,童年时代的小说与《红楼梦》的艺术美感自然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但那只是程度的不同,不是有无的差异。作为愉悦和审美的功能,是一切文艺形态之所必有,完全无此功能的小说在理论上也是不存在的。再者,它与别种纪实文学所具有的愉悦审美功能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换句话说,有无愉悦与审美功能并不是小说与某些实用性记事散文(如史传、通讯、报告文学之类)的根本区别。因此,我们在讨论小说发轫期时也就无须考察其时作品的这种功能。

发轫就是初生。我们说小说发轫于先秦,就是说,先秦已产生了具有上述特征的作品。虽然比起成熟的小说,先秦小说有如初生婴儿之于硕壮的成人,但它又是地道的小说,后世和现代的中国小说就是从那里蹒跚起步发展起来的。面对《穆天子传》《墨子·公输》《庄子·说剑》和《韩非子》中的师旷为晋平公演奏等一大批先秦作品,除了毫不含糊地称之为“小说”,没有任何别的称谓可供选择。谓之“前小说”或小说的“史前形态”并不确当,因为它们确是自觉虚构又非寓言的完整叙事之文。绿天馆主人云:“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①这位明后期的白话小说评论家追述小说的初生与发展言简意赅,甚具见地,只是误以为伪作颇多的《列子》真是先秦列御寇及其后学所作而已。

战国是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又是文体的蒙昧时代。儒、墨、道、法诸家争相为文,以彰显各自的治国之道和人生哲学,却没有现成的

① 《古今小说》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文体可供应用。早期产生的《论语》乃是语录,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语录的集合^①。更早行时的文体则是各国史官记述君臣言行的实录,即晋之乘、楚之杻杙、鲁齐等国之春秋是也。再有便是和传世的《春秋》同被后世称作“经书”的书,或为诗歌,或为卜辞,或为文告,或言礼制,显然都不适应争鸣的需求。诸家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造适应自己需求的新文体。这使战国又成了诸种文体丛生的时代。从这种意义上说,先秦又是百花齐放的时代。章学诚甚至说:“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②首先,诸子书中有相当多的论说文或论说成分,从《墨子》到《吕氏春秋》无不如此,只有先入子部后改史部的《晏子春秋》是个例外——全书叙事,与先隶史部后改小说部的《穆天子传》正同。但战国时期的多部子书虽有分量不等的论说文或论说成分,笔者所见却无一部为纯论说文,而是间杂多少不等又各自独立的叙事之文。其中《庄子》《管子》《韩非子》两者参半,《吕氏春秋》则大半都由叙事文构成。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时既无文体借鉴,也无文体制约,作者为求达意,可以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地挥洒笔墨;另一方面,大都广受史乘的熏陶,大量杂入叙事文乃是史乘影响的铃记。

不仅如此,思想解放的先秦作者,除史官之笔,也不受虚实、真伪的制约。周穆王西征本是传说,《穆天子传》的作者却通过想象将它铺叙成长达数千言的“排日的日记”,写的多是某日至某地、受某礼、赐某物等巡游的日常情事,谁也无法以口传诵,成为作者个人大肆虚构的叙事长文。远古的尧舜时代尚无文字记录,儒者为宣扬圣君圣臣,竟以渺茫的传说写出以人物对话为主体的儒家经典《尧典》(含今之所传《舜典》)与《皋陶谟》(含今之所传《益稷》),而那两篇《尚书》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凭空想象、虚拟的历史,即拟史小说。墨子后学为张大墨翟的功业,不仅不顾《战国策》和《墨子·鲁问》所写公输顺从墨翟之义而罢攻宋的事实,虚造公输欲杀墨翟等事,还让两人以腰带和牒片玩攻守游戏,甘冒“篡改”“虚造”

① 参见《汉书艺文志》,商务印书馆1955年重印本,第15页。

② 《文史通义》卷一《诗教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之名。这就具备了创造小说的重要条件:勇于虚构。而庄周及其后学,为宣示所持的带有神秘性的“虚无”之义、“无为”之道,索性远离人生世事,大起空中楼阁,创造了大批所谓“寓言”,其中许多都是今之称为寓意小说之作。让孔子、展禽、柳下跖等不同时期的人物共处、对话于同一时空,构成《盗跖》的奇特情节,更是大胆开创了寓意小说的新生面。宋代的黄震说得好:“庄子以不羁之材,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①后至《韩非子》与《吕氏春秋》,大量摭拾其时被书写或口传之事以为某种理义的例证,就其书而言,叙事是为证理疏义,独立性是相对的;而就其事而言,原在各书之外,是完全独立的叙事,其书采用的同时,也就记录、加工了原作,如果原为好事者自觉虚构之作,则无异记录、加工了一篇小说。两书有相当一部分叙事正是做了这样的记录和加工。所谓先秦诸子中的小说,除了诸子自己的创作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作品。它们对诸子书而言或可说是一种小说成分,而对它们自身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小说。

子书而外,非属史官记录的先秦史书也多少不等地麇入有意虚拟的小说类作品或小说成分。《逸周书》学界已有考辨^②。被历代文献书目多归入“杂史”的《国语》《战国策》,“拟托”之作不胜枚举,其中许多都是早期小说。另如《左传》,传解《春秋》自然“年月井井,事多实录”^③,但叙事亦不乏范宁所谓“富而艳”者,韩愈、弘历所谓“浮夸”者^④,不仅某些细致生动的描述加入了作者的想象,富于文学价值,也掺杂某些蓄意造作的叙事。《国语》与《左传》各有相当多的灵应预言,那是作者利用已知的春秋、战国史事为人物制作的先知先觉神话,均非史笔,而是自觉虚拟的早期小说或小说成分。

① 《黄氏日抄》卷五十五《苏子古史》,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新安汪佩鏦刊本。

② 参见胡念贻《〈逸周书〉中三篇小说》。

③ 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三,《崔东壁遗书》,清光绪五年(1879)定州王氏谦德堂刊本。

④ 参见《春秋左传注疏》卷首《御制读左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影印本,第134册,第2页。

战国这样的时代至秦统一就结束了。经过焚书之祸,两汉的经学与史学又大为发展,子书则相形而式微。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崇儒的同时,叙事尚实之风大兴。尽管某些经学家也编造上古帝王的名号与时代,却是打着古史的旗号堂而皇之进行的,与尚实之风表面上并不抵牾。王充的《论衡》就是尚实文风的鲜明标志,在破除种种迷信,指责种种“失实”“虚语”的同时,也奋力排斥虚构的“华文”。较之战国诸子,两汉时代由作者自觉虚构的叙事之文少之又少,充斥叙事之书的除去大量史传,便是民间传说。《越绝书》与《吴越春秋》虽有作者的变改、虚拟成分,不无小说之作,主体却是史事与传说的结合体。故钱福谓《吴越春秋》“大抵本《国语》、《史记》,而附以传闻者为之”^①。传闻或实或虚,甚或怪异荒诞,而“作者当时并不以为虚妄,而是信以为实加以记录”,从而“与小说家蓄意虚构有本质的不同”^②。便是成书于东汉荒诞不经的《列仙传》,主要也是民间传说,所以每篇都很短小,与后来羼入有意虚构、篇幅曼长的《神仙传》适成对照。不过,成书于西汉的《韩诗外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却各有大批自觉虚构的完整叙事之文——小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虚构之作不仅写的是先秦人事(写汉代人事者大都真实可信,甚少虚构),其本身也多属于先秦作品,韩婴与刘向主要是它们的整理者或应用者,在整理、应用的过程中有所改造与加工。因此,与其笼统称它们为汉代作品,不如将它们视为原初产生于战国时代更切合实际。至于《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产生年代虽还不能确定,其抄录、变改了许多先秦之作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也多有先秦人的手笔。这样看来,先秦战国不仅是中国小说的发轫期,也可以说是这种文体的勃发期,现存作品的总量多至数百,构成中国小说茁壮的童年。

传说源于远古,历代多有。至魏晋南北朝,佛道两教日盛,清谈之风大炽,以民间传说为主体的笔记小说日趋行时,志怪、志人之书风起云涌。志人多实,虚者多属传闻之讹,少有自觉虚构者。晋裴启作《语林》,“始

① 《吴越春秋》卷首钱福《序》,明弘治(1488—1505)邝璠刊本。

② 石昌渝:《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后谢安谓其记述自己之语不实,为裴氏自撰,“《语林》遂废”^①。这种变化充分显出当时传写人事的崇实鄙虚之风。至于神怪传说,由于宗教观念和民间信仰,言者、记者多如干宝,深信“神道之不诬”^②。从这种意义上说,亦属“纪实”。听者、读者也多作为实言实事予以接受。此等记述人事与神怪民间传说的“从残小语”虽繁盛于六朝,却在其后代代相传,不绝如缕,直至清末,成为全然不同于自觉虚构小说的另一类小说文体,自成“笔记小说史”。然而,在大量传说中,也逐渐产生少量篇幅曼长之作,并出现某些单篇作品。文人的整理和写作逐渐渗入自觉虚拟和创造成分,成为一种新体小说——准传奇。除成书年代尚难确定的《燕丹子》《汉武帝内传》,又有张敏的《神女传》、曹毗的《杜兰香别传》、无名氏的《赵飞燕外传》等。《搜神记》中收录的紫玉爱恋韩重的故事、卢充入崔少府墓的幽婚故事,虽非单篇作品,也都是情事婉转的准传奇小说,成为后来唐传奇的先声。《神仙传》中的某些作品也应视为这种文体。所谓准传奇,是指并非全然由文人个体有意造作的传奇,而是在传说基础上由文人加工掺入某些自觉虚构成分之作。但总观这一时期,自觉虚构的叙事之文仍比较少。倒是一部充作先秦之作的《列子》横空出世,除了抄袭《庄子》之文,更大力效法、发展《庄子》笔法,创造一批富于特色的寓意小说。这部打着先秦旗号的“伪书”,也是先秦小说文体勃兴的余光返照。还有皇甫谧与嵇康,各编创一部《高士传》,本为赞赏历代“身不屈于王公”之士^③,却因将《庄》《列》两书中一些虚造的人事错认作史实,也造成一批小说作品。

纵观中国早期小说,虽多短小、粗糙与稚拙,却多种多样,拟实与表意两大类都已有相当的数量。其中拟实类以拟史为主。在“六经皆史”、各国皆有“春秋”的时代,早期的许多小说以史传的形态出现,是史之分流,可统称为拟史小说,乃属拟实小说的一种。其特点是以历史真人之名写作者虚拟的现实性言行事迹。它在早期小说中占绝对的优势,实为早期

① 《世说新语》之《文学》《轻诋》,参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笺疏本,第269、844页。

② 干宝:《搜神记原序》,《搜神记》卷首,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③ 皇甫谧:《高士传序》,《高士传》卷首,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拟实小说。后世拟实小说的人名一般也是虚拟的,而早期小说除寓意者外,拟实者大都用历史中的真实人名。这既是它源于史之母体的胎记,也是它虚构性尚不充分的标志。它与属于拟史小说另一类型的后世历史小说既有相似,又有分别。后世历史小说,不仅人名取自历史,题材和事迹主干也大都取自史书,在史迹的基干上展开想象和艺术虚构。就上述品格而言,早期拟实小说介乎后世一般拟实小说与历史小说两者之间。本书中常称拟史为拟实,前者乃后者之一种也。在拟史小说中,存在不少仿改之作,或仿改史书(如将真实的史记改变主人公姓名而成的小说),或仿改别的小说。其中多为简单的仿造或改写,是早期小说稚拙的突出表现;也有少数独具创意者,能推陈出新,成为后世改旧翻新小说的前驱。

早期表意小说虽也不乏夸诞的写意之作,却以寓意体式为胜。史传中常见的虚拟的预言就是寓意体式的一种。《庄子》与《列子》更是早期寓意小说的奇迹。以今之文体特色衡量其文,两书虽有一定数量的寓言和寓意小品,更多的却是寓意小说。特别是《庄子》,以其极富人生哲理的深刻寓意、丰富多彩又翻空出奇的超验意象成为一个时代寓意文学的绝唱。它与后世道教的观念、旨趣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而少数篇章对神仙人物的奇特想象与造作却又可说是后世某些道教小说的滥觞。

最后谈谈早期伪书与小说的关系。从史家角度看,《穆天子传》或为“伪书”,那是因为某些史家曾错把这部小说当成史传。其实书并不伪,因为它并未冒充史传。《孔子家语》《孔丛子》不同,从其冒充孔子及其后代的真实事迹而言,自可说是“伪书”;至于魏晋人集句而造的古文《尚书》更是地道的伪书。然而,伪书非指文体,也各有其文体,或为议论文,或为叙事文。如果是后者,恰好就是有意虚造史迹之作;又由于早期小说的叙事大都简略,与史作的叙事略无分别,叙事伪作的文体自然就成了早期小说。

目 录

中国小说发轫于先秦	
——代前言	1
《穆天子传》——大气磅礴开山祖	1
附：《穆天子传》纪时考议	10
《晏子春秋》的虚拟成分与文类辨析	19
《国语》《左传》的虚拟成分与文类辨析	59
《庄子》寓意文体辨析	86
先秦四部子书之小说考辨	113
《战国策》之小说考辨	140
《管子》之小说考辨	157
《尚书》之拟史小说考辨	174
《韩诗外传》之小说考辨	192
《新序》《说苑》之小说考辨	212
《列女传》之小说考辨	240
《列子》寓意文体辨析	277
《孔子家语》《孔丛子》之小说考辨	294
《高士传》编创之小说考辨	311
后 记	325

《穆天子传》——大气磅礴开山祖

中国小说始于何时,近些年来其说不一:谓汉代者有之,谓魏晋者有之,谓唐代者亦有之。至于先秦,小说史论著或不予置论,或谓之“前小说”时期。所谓“前小说”,就是含有某些小说因素的非小说,如神话传说、史传文学、诸子寓言之类。然而,就在战国中后期的公元前 295 年,一部洋洋近万言的虚构性散文叙事作品^①,被埋入魏襄王墓,它其实是我国小说的开山之祖——《穆天子传》(下简称《穆传》)。

这部用蝌蚪文书于竹简的六卷之作,以干支排日形式叙述公元前九世纪周穆王巡游天下事。从晋武帝太康二年(281)盗发出土之后^②,长期被视为帝王起居注或传记类史书。尽管早在唐代就有柳宗元提出“其书尤不经”的见解^③,却并未动摇它在古目录书中的史书地位。至明后期,胡应麟始于此书有“颇为小说滥觞”之语^④,但仅指其中详述盛姬丧葬的第六卷。后经清代特别是近现代史学家和文献学家的质疑、考证,反复论辩,如下两点已是广泛认同的事实:(一)其成书年代不是西周,更不是穆王在位之时,而是上距穆王数百年的战国中期或前期。(二)与前一点相关,其主体内容特别是前四卷西征绝不是穆王巡游的实录,而是在传说基

① 《穆天子传》出土后即无完帙,而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传记类记载,“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

② 汲冢古籍的出土年代还有咸宁五年(279)、太康元年(280)两说。此从荀勗《穆天子传序》。

③ 《观八骏图说》,《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468 页。

④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四《三坟补逸下》,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7 页。

础上大力生发、想象、虚构的产物。且不说某些神异成分,即西巡规模之大、行程之远、道途之险、历时之久以及穆王在外域各邦威望之高、与犬戎等异族关系之融洽,都大大超出其时自然与社会的条件及史料显示的客观实际;其错以洛阳为宗周且以洛阳为起讫的西征路线更是东周人的主观设计和造作,显出全局的虚拟性质。因此,它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但它是什么作品呢?文学史家大多谓之神话传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讲“神话与传说”时举出《穆传》,但只录其见西王母和高奔戎搏虎两段,似非泛指全书。后出与晚近的某些小说史论著则概言《穆传》与《山海经》是“两部汉以前的以神话为内容的书”,甚至说《穆传》“属于搜奇志怪的系统”,“是最完整的一部古代神话传说”。

《穆传》是神话吗?决然不是。即以仅存的六千余字文本而言,绝大部分是拟实性文字。通篇是写周穆王驾八骏、率六师巡游天下的人事活动:登山涉水,观光打猎,刻石铭迹,饮酒赋诗,瞻仰黄帝之宫,朝祭宗周之庙,奖励擒虎壮士,泣葬夭亡爱姬,更多的是到处接受外域部族首领的膜拜、献纳,赐赠给他们金珠宝物。超验的神异荒诞之笔寥寥无几,除“天子其遗灵鼓,乃化为黄蛇”(卷五)而外,主要就是卷三写的于瑶池会见西王母事。那事其实也并不怪诞:献礼,进酒,对歌,全然不像神话,而像“人话”。只是“我惟帝女”的谣词和穆王异乎寻常的虔敬态度(宾见择吉、馈赠称“献”之类)显出西王母超凡的身份和地位,也显出它与先秦古籍《山海经》《归藏》等书中神话人物西王母的连带关系^①,从而使这种会见有了某种谒神的意味。但即使将它计算在内,幻异之笔所占的篇幅也只有全文的百分之几。怎能以此概言《穆传》是“神话”呢?胡应麟说:“《穆天子传》所记山川草木鸟兽皆耳目所有,如《山海经》怪诞之文百无一二也。”^②顾颉刚先生经过一番考辨写道:“自从到了‘积石南河’,作者就开始采用《山海经》的名词”,“他作得与《山海经》不同的一点,就是他不敢

① 萧统编《文选》卷六王僧达《祭颜光禄文》李善注引《归藏》云:“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38页。

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四《三坟补逸下》,第343页。

神话”，“把一切现实化了”^①。这些论断才符合《穆传》文本的实际。有人将卷一所写的穆王在燕然山下大祭河神拜受帝命之事也说成神话，其实，那个隆重的朝祭仪式完全是当时人的现实性迷信活动，类乎后世的巫祝请神，是通过人即河宗柏夭之口把上帝之命传达给穆王，既不见神人，也没有幻事，是很生动的拟实之笔。

《穆传》非但不是神话，其主体内容也不是传说。传说只有两种：一种有较强的故事性；另一种无故事性，甚至无叙事性，而有新闻性或特异性。前者可长可短；后者都很短小，也必须短小，如《山海经》中荒诞的殊方异物之类。换句话说，漫长的传说非有较强故事性不可，否则无法口传。《穆传》若长的记叙文字，却没有什麼故事性，只以起居注的形式按日记述穆王所到之地及大同小异的献赐活动，笔墨粗简，而于时日干支、行经地域及部族、献赐物品及数日记述甚详，六千余字中仅干支纪日就多达一百四十个。这样的内容根本无法以口相传。《穆传》的基础素材主要是穆王西巡的民间传说，作品也保存了驾八骏之乘、以造父为御、会见西王母、高奔戎搏虎等传说内容，但篇幅很少。作者在对这个传说的再创造中，以大量穆王巡行的日常活动稀释并溶解了传说的故事性，使作品成了穆王西征的“一部排日的游记”（顾颉刚语），从根本上改变了素材原生态的传说性质，从而获得自觉虚构的书面叙事文学的小说品格。

这里说的小说，系以近世文体观念为参照系，而非古目录学之谓小说。认《穆传》为“小说”也由来已久。早在《四库全书》之前的《天一阁书目》就将它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四库全书》编者在《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中还特别说明将它“改隶小说”的理由：“多夸言寡实”，“为经典所不载”。不过，古目录学的“小说”内涵没有内容与形式的明确性，其外延异常宽泛，即使范围大为缩小的《四库全书》也将“杂事”“异闻”“琐记”尽隶小说，将《山海经》与《穆传》并入“异闻”。从这方面看，明清目录学家认《穆传》为小说与今之小说史家认《穆传》为神话并不抵牾。前者小说观念的外延包含了后者之谓神话。近之学者经过考辨也有称《穆

① 顾颉刚：《穆天子传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7月出版。

传》为小说而非神话者,但也多指古小说观念而言,有的还特别申明:“很难与后代小说观念合拍”,“应列入班固所说的‘小说家者流’”^①。其实,《穆传》不仅合于包罗广杂的古小说观念,也属近世文体学的小说范畴。试想,一位战国时期的作者,用其拥有的历史的、地理的、自然与社会的知识、经验,将有关数百年前穆王巡游的本事传说改造成为貌似后世帝王起居注的“排日的游记”——只能阅读不能口传的虚构性的书面叙事文学,这是多么巨大、新奇的造作!作者模仿当时“君举必书”的史官之笔杜撰出穆王数年巡游中百数十日的行程、地望、境况、作为,构成一部似真非真、以假乱真的穆王春秋——编年史体(实际就是以第三人称作叙述的日记体)作品,这又是何等大胆、自觉的创作意识!这种既非神话也非传说的虚构性拟实的叙事散文,即使出现在今世文坛,也只能认它为小说,而且还属于那种易得评家青睐的体式别致、不编故事、写出了现实自然生态的散文化小说。惜其出世太早,在被史学界错爱十数世纪之后一旦抛撇,文学界看它反觉眼生,不敢冒认作小说之祖。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其确凿的小说品格终将使它归于祖位。

值得注意的是,编年史体小说在小说史上非此一种,时隔两千多年的清中叶又产生一篇《扶风传信录》,体式、样态、创作途径与《穆传》如出一辙。据《宜兴县志》及钮琇《觚剩》、王士禛《居易录》等笔记记载,清初康熙间宜兴地区流传着书生许丹忱与狐仙胡淑贞婚恋生息的传说,还有人写成文言小说《会仙记》。至嘉庆间,吴骞自称得到许生祖父的亲笔实录“《叙事解疑》一帙”,“年经月纬,排日按时”,由吴氏“删其繁芜”,辑成是篇。“扶风”是宜兴桥名;“传信”以为“解疑”,所谓“较得之传闻者为确凿可据”^②;题拟唐郑棨的《开天传信记》。全文约六千字,为《会仙记》的六倍,计列四年间 119 日事,于主人公往来酬答或略或详,散同信史,从而把一则民间传说稀释成无法口传的文言小说。这与《穆传》的创作何其相似?真可谓无独有偶。清代是小说鼎盛期,此等作品价值甚微,但它硬

① 郑杰文:《穆天子传通解》,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2 页。

② 吴骞:《扶风传信录序》,《丛书集成》初编第 2726 册,商务印书馆 1939 年初版,1959 年补印本。

将荒诞的传说一一落实为当事人手记的努力让我们看到儒家重史重实的文化观念对作家心态和作品形态的强力影响,同时也让人看到《穆传》创作途径的一次生动的演示。这不是说作者有意模拟《穆传》,两者的相似应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艺术创作同构现象,是共同模拟编年史体的自然结果。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远哉遥遥的小说之祖的呱呱诞生。

我们认《穆传》为小说之祖,有如下两个方面的考量。其一,它是不依附于任何子书与史书而自成一体的绝然独立作品,且篇幅曼长,结构严整,在先秦可称小说者中绝无仅有。其二,其语言与文风,较战国中后期出现的包含小说或小说成分的诸多子史之作更古朴、更粗糙,少有对话与铺陈,因此,其成书时间虽不能确定,多应早于那些子史之作。

从没有任何小说的战国前期或中期冒出这样一部出奇特异的长篇大作,似乎太奇突、太超前了。但只要想到在它之前不仅已有千年史官记事的历史,而且已有编年体经典史书《春秋》传世,《穆传》的产生也就不足为怪。我国早期小说乃史之分流,史志是小说之母,小说开山之作效法各国“春秋”的史家之笔,取“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年形态是自然的事^①。两者之间只横着一条从纪实到虚构的鸿沟,跨过这条鸿沟就是彼岸。这与近世产生的日记体、书信体、词典体等变体小说,既相似,又不同。《穆传》之仿史志颇似后者之仿日记、书信与词典,从而显得富于创造性和创作意识。但后者是在小说成熟之后对其体式、形态、功能、审美取向高度自觉的艺术追求,创造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美文特征,一望而知是小说,不会与其仿拟的应用文体相混淆。如果说这是小说的散文化,乃是高层次的散文化。《穆传》不同,其时既无小说观念,也无小说样态,只将《春秋》一类记述简括的编年史书作参照物,内容虽多虚拟,样态却近实录,不作深细考辨就难与史籍相区别,以至长期被视为信史,而被多作考证的文献学家斥为“伪书”。这正反映了小说初生之际与其母体过于相似难解难分的胶着状态。它的散文化也是初生小说稚拙

^① 杜预:《春秋序》,《春秋经传集解》卷首,《四部丛刊》本。按:《穆天子传》不以序数纪月,而以“孟春”“仲秋”等十二纪兼顾纪月与纪时,这也是它晚出于战国时期的一个证明。今所见《穆传》不见纪年,似非不记,或遗而致缺,参见拙文《〈穆天子传〉纪时考异》。

的表现,有史体散文的鲜明胎记。

不过,作为小说之祖,《穆传》仍是破天荒的艺术创造。除已论及的虚构性之外,其内容、意蕴、笔法、格调、形象结构也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编年史志,初具小说的品格特征。

其一,《穆传》自始至终写穆王巡游,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中心事件,而且有表现的思想主题。这使作品的形象结构单纯、集中,条贯统绪,有小说结构某种特有的凝聚力和艺术张力,与散记许多不同人、事的编年史书大相径庭,也有别于后出的史传和起居注。起居注虽有中心人物,却无中心事件和思想主题,更无形象结构和艺术张力。就此而言,它与《穆传》只有按日记事的形似而已。史传虽比《起居注》集中,只记传主的主要事体,但一般并不专记一事,没有贯通首尾的中心事件和思想主题。明代就有人因《穆传》只写巡游“不及他事”而对书题提出质疑:“何以‘传’也?”^①据相关文献记载与史家考证,此书出土时原本无题,或已缺题,今本之题系整理者荀勖所加,晋时另有题作《周王游行》或《周王游行记》之本^②。此题虽未流传于后,却更合于作品实际,且能显出具有中心事件和主题的小说意味。

其二,《穆传》的主题是与穆王的形象创造相表里的。作为小说的初生儿,穆王形象诚然稚拙、粗糙,缺乏后世成熟小说人物的鲜明个性和生命活力,即使比之《左传》中的某些人物也逊色得多。但它仍是被作者赋予特别意蕴的人物形象,从而有别于史传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创造者意向的物化符号和载体。纵观《穆传》,特别是主体内容的西征,是将传主作为一位心念黎庶、协和万邦而广受拥戴的仁明天子和英雄天子加以表现、歌颂的,同时造成一个熙和承平的盛世气象。这一主题不仅有违西周铭文、《国语》等史料显示的穆王对异族大肆征讨的客观实际,也改变了本事传说本来的思想倾向。《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革说:“昔穆王

① 唐琳:《穆天子传叙》,载明天启间杭州刊《快阁丛书·穆天子传》卷首。

②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之孔颖达“正义”引王隐《晋史·束皙传》述汲冢竹简古书曰:“《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传记类云:“《穆天子传》六卷……郭璞注本谓之《周王游行记》。”